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2.011

湖南省参议会对湖南和平解放态度的转变

张 熙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湖南省参议会自成立以来便长期对中共持敌对态度, 然而, 随着赵恒惕辞去议长职务、唐伯球补选为议长, 省参会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对待和平的态度上, 省参会先后放弃了“备战求和”“保境恤民”等选项, 也放弃了中利于国共两党外进行自治的方案, 转向接受毛泽东和谈八项条件的声明。其与人民的关系也经历了从不被信任到被人民接受的转变过程; 在与人民团体争夺话语权及应对白崇禧施压的过程中, 大部分参议员最终选择配合程潜进行和平起义, 迎接湖南解放。

关键词: 湖南省参议会; 湖南和平解放; 赵恒惕; 唐伯球; 白崇禧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2-0080-09

引用格式: 张 熙. 湖南省参议会对湖南和平解放态度的转变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2): 80-88.

Shifted Attitudes of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Towards Hunan Peaceful Liberation

ZHANG Xi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has longstanding hostility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wever, with Zhao Hengti's resignation as the Speaker and Tang Boqiu's by election as the Speaker, the attitudes of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undergone a subtle change.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peace, strategies like "preparing the fight before the peace negotiation" and "guarding the provincial border and caring for the residents", were rejected successively by the Provincial Council, and the proposal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and remaining neutrality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were dismissed as well, turning into accepting the eight conditions of peace negotiation by Mao Zedong. Meanwhile, people in Hunan also shifted their skeptical view of the Provincial Council into trust. Eventually, in the process of competing with people's organizations for the right to speak and coping with Bai Chongxi's pressure, most Council members finally chose to cooperate with Cheng Qian in a peaceful uprising to meet the liberation of Hunan.

Keywords: Hunan Provincial Council; Hunan peaceful liberation; Zhao Hengti; Tang Boqiu; Bai Chongxi

目前学界对湖南和平解放的研究尚集中于个别人物与解放的关系, 或聚焦于湖南省军政领导

收稿日期: 2021-11-23

作者简介: 张 熙(1994—), 男, 湖南怀化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史。

高层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如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个别高层人物响应起义的过往^[1-3]；或突出民主人士响应中共号召所发挥的作用，如仇鳌、陈云章等人在此过程中所作的合作贡献^[4-5]；或重现中共地下党在此历史进程中的秘密活动，如描述周里、余志宏等人为争取程潜等站到人民一边所进行的地下活动^[6-7]。一方面，这些文章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论文，其中多数当属回忆文章或纪念性文字；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不够严谨，且依据的史料较为单一，其多为事后多年的口述或回忆录，缺少对当时报刊文字的参考。

除上述成果之外，学界对湖南省参民意机关——省参议会在湖南和平解放过程中所起作用着墨尚少，未有过多的关注。实际上，湖南省参议会作为彼时的民意机关，对湖南前途、命运的选择可谓一波三折，号称代表民意的参议员们对此也是心态各异。这也部分表征了在此社会剧烈变迁的过程中，湖南省各地的民意对湖南求取和平及如何求取和平的意见不一。考辨省参议会在这过程中前后不一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湖南省（至少就省会而言）为何最终选择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模式，而最终放弃了其他形式的考量。通过对湖南省参议会关于湖南和平解放态度转变的研究，或更进一步说，通过对其对中共态度转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为细致、准确地认知湖南和平解放这段特殊的历史。

本文拟从三个阶段对湖南省参议会态度的转变过程进行分析，这三个阶段的主题可概括为赵恒惕任议长时省参议会对于中共之态度、唐伯球任议长后省参议会态度的转变、省参议会对于湖南和平解放的积极参与。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湖南在追求和平的时候是否有多种名同实异的方式？（2）湖南省参议会在多种和平方案中为何选择了接受解放的方案？

一 赵恒惕任议长时省参议会对于中共之态度

湖南省参议会对于中共之态度由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受议长态度、参议会自身性质与参议员态度三方面影响，其中议长又能直接影响到参议员的议政取向，故对整个参议会的态度起引导性作用。由外部环境观之，

则是因为国共内战的局势走向以及湖南省内治安问题的刺激，促使省参议会不得不回应与之相关的问题。

从1946年5月湖南省参议会正式成立，到1948年12月底赵恒惕请辞议长期间，赵恒惕长期担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一职。若从1939年8月湖南省临时参议会的成立开始算起，则赵恒惕担任议长时间长达近10年。由此可知，赵恒惕个人对省参议会及参议员的影响之大。

赵恒惕（1880—1971），字夷午、彝午，号炎午，湖南衡山人。湖北方言学堂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毕业。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学成回国后，随蔡锷主持广西陆军干部学校，训练新军。辛亥革命时，任广西新军协统，促请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时，与谭延闿在湖南响应；失败后，被袁世凯逮捕解送北京，囚禁多年。袁世凯称帝后特赦出狱，返乡后策动倒袁运动；不久，即被任命为湘军第一师师长。1921年，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敦聘王正廷、蒋方震、李剑农、钟才宏等创制省宪。为保境安民，与谭延闿通电主张联省自治，他自己也成为湖南省第一位民选省长。1926年，赵恒惕被唐生智驱逐，交卸省政，十年不问政治，潜心修佛，直至“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员。1939年，又担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直至1946年，湖南省参议会成立，当选为议长。

赵恒惕对共产党素来怀有敌意，这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他任湖南省长时，便十分反对工人运动。1922年1月，赵恒惕残忍杀害了总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关闭了总工会和《劳工周刊》，引发了重大反响。彼时尚有反对工人运动的安徽驻沪劳工总会对于赵恒惕充满幻想，期望他“提倡劳工，恢复工会”。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对此极力反击，称“以赵恒惕这样惨杀劳工的军阀，这样摧残劳动运动的军阀，竟有希望他‘提倡劳工……时加奖饰’的工会，我们忍不住要说：这是工人阶级的大耻辱呵！”^[8]由此可见当时赵恒惕对共产党敌视程度之深。

就现实政治而言，赵恒惕当选为省参议会议长时，正值国共内战爆发时期。赵恒惕认为湖南于抗战胜利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战后的重建是重中之重，但他将湖南战后重建的期望，寄托

于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上。这个统一的意志，自然是蒋介石的独裁意志，而集中的力量，不外为中央政府统治下的政府力量。因此，他在《湖南省参议会会刊》创刊号上所发第一篇文章中，便把矛盾指向中共，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体念时代之需求，不顾及国脉之危殆，拥兵称乱，逞意妄为，以致动荡之政局，日益纷乱而不宁，憔悴之民生，日益痛苦而加剧”^[9]。在他看来，唯有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确切认定“政令之必须统一，军队之必须国有”，才能恢复国家建设。随着国共内战的深入，蒋介石于1947年7月4日颁布《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实行“戡乱”救国政策。国民政府意识到局势已经出现巨大危机，然尚未到无可挽救地步，仍认为以自己的力量可以戡平“叛乱”。赵恒惕此时自然更殷切期望国民政府能全力“戡乱”，完成其建国大业。赵恒惕单方面的愿景，无助于国民政府增强“戡乱”力量，也无益于湖南的建设事业，却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参议会和参议员们的情感态度，此点待下文论证。

从省参议会的性质来看，其虽属民意机关，但与政府及国民党的关系却格外微妙。其与西方地方代表机关不同，因为在实行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中，议会与政府的关系常表现为制衡关系。就事实来看，西方的议会与政府之间亦时常出现激烈的矛盾冲突，这样的状态在中国民意机关与政府之间似并不常见。二者之间虽偶见激烈交锋，却多为意气之争，绝少理念之不同的情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意机关与政府能够保持友好关系，甚至对政府有一定的依附性。从法规条文来看，1945年施行的《省参议会组织条例》中第十九条“省参议会决议案，咨送省政府执行，如省政府延不执行，或执行不当时，请求说明理由，如仍认为不满意时，得报请行政院核办等”，第二十条“省政府对于省参议会之决议案，如认为不当，得附理由送请覆议。对于覆议结果，如仍认为不当时，得呈请行政院核办”。由此观之，府会之间若有矛盾，最后的仲裁权仍归于行政院。行政院因其自身属性，自然会偏向于省政府一方。更有甚者，“行政院长对于省参议会之决议案，认为有违反三民主义或国策情事者，得提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解释，依法重选”^[10]。可见，与西方国家的议会相比，省参议会缺少强有力的

监督权，本质上还是为配合政府推行政令的民意机关。值得注意的是，参议会对政府的附和多为对国家事务的响应，一旦关系到具体地方事务时，二者的处置方式便可能出现分歧。

至于参议员们的态度，则稍显复杂。这里暂不讨论每位参议员的意识形态因素，仅探讨他们与政府要员们之间的关系，并略微分析他们对议长赵恒惕的态度。需要承认的是，在历次大会中，都有参议员积极质询政府官员的情形，并有激烈辩论的场合，但就整体关系而言，大多数情况下，参议员认同政府官员的做法。以湖南省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为例。该次大会从开会到散会，各参议员的饭局可谓是应接不暇。从1947年6月16日开幕那天起，便有省府主席王东原及各厅处长招待，直至宾主尽欢而散^[11]。大会期间与闭幕前，又有各机关首长纷纷宴请各参议员，参议员们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如此频繁的宴请与畅谈，何以保持参议员对政府要员的监督呢？不仅如此，闭幕以后，王东原主席又给每位参议员送了所谓的“驻省费用”50万元。除参议员彭绍香一人三次拒收外，其余人都悄悄收下了^[12]。这种情况，也成为日后民众对参议员们组织的“和平促进会”缺乏信任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排除个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或可从参议员与政府本身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当中管窥一豹。依据政府规定，参议员均为无给职，且不得直接兼任公务员，但实际上，当时的参议员中兼任有给职的并不在少数。缘于此，参议员也长期被外界视为政府的“应声虫”。也正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在省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第二次会议末了时，自称中立派的参议员黄甲，提出“讨伐中共，要求政府戡乱”的临时动议，会场上竟“掀起了一阵掌声”^[13]。这也说明了该次大会中，赞同政府立场，意欲“讨伐中共”的参议员不在少数，“讨伐中共”为多数人的共同意见。

除上述内容外，再看看参议员对议长赵恒惕的态度，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彼时参议员对中共态度何以如此敌对。纵使不必相信这些参议员们具有“乌合之众”般的群体无意识行为，个人实为群体所裹挟，也仍有必要相信在缺少多党制衡的参议会中参议员受议长影响之事实。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召开的第一天，进行了议长和副议长

的选举。最终参选议长者有赵恒惕、张炯、方鼎英三人，实际得票数为赵恒惕 40 票、张炯 35 票、方鼎英 1 票。第一届参议员共有 78 人，到场 76 人，赵恒惕获得了正好过半数票。这 40 票的组成情况或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上文黄甲所代表的“中立派”，一部分是反对 CC 系力量最甚的三青团派的部分人员，其中尤以李树森领导的军人团最为支持赵恒惕。CC 派的代表张炯获得了该派的全力支持，还获得了三青团中由周天贤（与张炯同乡，为湘西人）领导的学生团的票数。支持赵恒惕的 40 票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死党票，这些死党对赵恒惕的依附性自然极大。通过上述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自称中立派的黄甲会提出如此激进的临时动议，且还获得了一片掌声。

二 唐伯球任议长后参议会态度的转变

1948 年 7 月，程潜接替王东原省主席的职务回湘主政，由此府会关系发生了微妙的转折。

是年春天，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情绪黯然。蒋介石一方面为牵制白崇禧，一面为安抚程潜，任命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程潜返湘后，外界有关程潜与赵恒惕的关系传出了诸多声音。就过去 30 年的历史来看，两人既有合作，也有矛盾，但总的说来还是交恶较多。故在湖南省主席人选的问题上，赵恒惕并不倾向于程潜。何应钦曾询问赵恒惕关于湖南省主席人选意见，赵恒惕答，并无意见。在何应钦追问之下，赵恒惕方说出自己真实想法：属意王东原留任，但担心在京湘人的是非口舌，故表示无意见^{[14]75-76}。

在程潜就任湖南省主席期间，赵恒惕暗中对其政策表示不满。自省参会一届五次大会后，他就很少再出席会议，即便出席，亦很少发言。恰逢此时，唐生智即将来长，并传可能出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当时，外界也传出了参议会倒赵的消息。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彼时最殷切期望唐生智出任议长的便是与唐生智同乡（东安县）的参议员席楚霖^[15]。席楚霖一度表示，自己愿意让出东安县参议员的名额，由唐生智补选，随后名正言顺竞选议长。以唐生智的声望，只要他愿意，当无任何问题。赵恒惕或是听闻了这一消息，就愈发不敢开会了。

1948 年 11 月，南京要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程

潜与赵恒惕收到电令，赴南京参会。赵恒惕赴南京后，即患严重的尿闭症，就医于南京中央医院，随后不久又赴台湾养病。期间，程潜虽多次催促他回湘，均被其拒绝。依赵恒惕自己口述，彼时，他自觉在湖南已无有作为，加之疾病未愈，故去电请辞议长职位^{[14]76}。

议会通过议长辞职后，随即而来的便是议长补选。当时最有力的竞争者有方鼎英与唐伯球两人，其中方鼎英的呼声尤高。在选前与选后，舆论倾向于方鼎英接任议长，故大家对唐伯球能当选议长颇感意外。这也足见唐伯球虽长期担任副议长，但其并未在社会中积攒足够的威望来使自己轻易当选，这也是其后来虽积极参与和平自救活动却威望不足的原因，亦是其不足以完全掌控参议会的原因所在。

在补选议长前，省参议会曾有讨论，认为新任议长最好是军人出身，且在社会各界有很高的声威，如此方能让所发电报受人重视。最合适的人选大家普遍认为是方鼎英，因为方鼎英是军事教育家，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兼教育长，在国共两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中都有他的学生。如此，他可利用自己的老师身份调解二者的关系。当时，就连唐伯球选前也一度表态自己保证投方鼎英一票^[16]（选举时他确实投了方鼎英一票），可见唐伯球本人对自己被扶正为议长并无自信。但在选举当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天实际投票人数 85 人，得票数为唐伯球 46 票、方鼎英 33 票、李国柱 1 票，另外还有 5 张废票。之所以出现这种逆转，乃唐伯球一方，在选前半天采取紧急措施，使得参议员中的游离分子和民社党、青年党两党中的参议员临时变卦，这样，原本要投方的票就全部转投给了唐。另外，唐伯球一方对李国柱也是采取弃保策略，这才使唐得以获胜。游离分子和民青两党的临时变卦不无原因，据外界分析，是他们担忧方鼎英与省府关系不合。方鼎英虽有各方面的优势，但与程潜个人关系并不好，且个性要强，这些人担心将来他与省府配合有问题，故临时变卦。

唐伯球原来是实业家，军政二界都有参与，但显然不如方鼎英涉入得深。他起初作为赵恒惕的搭档竞选副议长当选。在外界看来，他和赵恒惕是一个圈子的，故能得到赵恒惕死党的部分支持。

此外,他在参议会中人缘也不算差,只不过旁人觉得,他人缘不差,但尚不够格担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可大家也承认,他与省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据唐伯球回忆,程潜确实在此次议长补选过程中支持他当选议长^{[17]306-307}。这样,唐伯球出其不意,在关键时刻逆转了局势。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在外界看来,唐伯球是和赵恒惕一个圈子的,但在赵恒惕看来,唐伯球却是程潜的羽翼^{[14]306}。以赵恒惕与程潜不和的关系来看,唐伯球能同时依附于此二人,足见其在人际关系的沟通方面确有过人之处。

议长选出后,由于唐伯球原先是副议长,他需要辞去副议长才能就任议长,副议长则需另选。唐伯球是湘西人,为考虑地区平衡,副议长人选原则上考虑为湘南或湘东人,并在彭绍香(茶陵县人,属湘东)和席楚霖(东安县人,属湘南)二人中选择。此二人的影响在伯仲之间,各有优劣。但是在活动方面,湘南人士显然更为活跃,他们想方设法为席楚霖壮大声势。最后投票结果为席楚霖44票、彭绍香27票。这场选举被外界看作一场颇具风度的选举,故席楚霖的当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此后,席楚霖亦以积极姿态为湖南寻求和平四处奔波。

唐伯球就任议长后,起初在宣言中尚以武力自卫为轴心,尚未超越参议会的既定方针,但因为两件事的发生,使得情况发生了微妙的转折。这两件事情其一是为响应湖北省参议会决定,成立和平促进会;其二是1949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声明和谈八项条件。

彼时,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想通过“和平解决”的幌子逼蒋介石下野,以便李宗仁取而代之。湖北省参议会首先响应,致电蒋介石要求“恢复和谈”^[18],并通电各省,冀求响应。1月3日,湖南省收到通电,针对该事举行座谈,作为响应。学界以往对和平促进会的评价很高,认为其代表市民的请求而成立,反映了民心的取向,但在当时的舆论界看来,和平促进会最初的性质恰恰并非主和,而是主战。此时的淮海战役已步入尾声,平津战役却尚存变数。其中围绕主和还是主战的问题,在1月5日的省参议会座谈会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次座谈会名义上是呼吁和平,但实际上多数人的所谓“和平”是决意与

中共作最后决斗的“和平”,而绝非欢迎解放的和平。以蒋鹏翥为代表的坚决主战派声称“湖南人应团结力量,与共党作最后决斗,不必应和人家幼稚呼声”^[19]。幸而唐伯球出面,及时纠正这一观点。唐伯球认为,征兵征粮人民已经负担不起,自己能不能代表民意争取和平是一回事,事实上能不能做到则是另一回事。可见唐伯球就任议长后不久便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已敢于在会上针对求战的声音声明自己的主张(原因详后)。

此次座谈会显然没有解决内部争议的问题,加之湖北省参议会此时呼吁和平的主张得到多省响应,省参议会于是决议约集省会重要领袖继续对此事详加讨论。这些重要领袖也就是社会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省参议会希望扩大座谈会,对事情进行进一步的商讨。这次座谈会于1月14日召开,与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和谈八项条件是同一天。但当天这些代表尚未悉知该份声明,对这份声明的讨论也是数日之后的事情,当日会议似乎是为拥护蒋介石在元旦发布的《和平文告》而开。据报道,会议虽以“促进和平会”为名,实际上会上一片备战声^[20]。

省参议会第一次态度的转变,是在1月17日为和平促进会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出现的,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便是毛泽东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声明。这八项条件包括:(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21]。可以说这和谈八项条件的声明,分化了原本还欲以战求和的顽固派阵营,使部分人逐渐接受了八项主张,至少对其予以了重视,一系列围绕它的讨论也在逐步开展。1月19日,唐伯球议长在会上发言,他说:“站在人民方面,当然只有和平之一途,以战求和应该考虑是不是还有战的力量,假如没有战的力量,莫说八项条件,就是十条二十条,也要逼着你接受,戡乱到今天,兵牺牲完了,粮搜殆尽,连人民一点点黄金也运走了,谁还能说以战求和的话,除非是丧心病狂,我们只希望实实在在的实现和平,不要徒托空言,共产党的八条提出来了,第一条最重要,他逼着

人上断头台。那个愿意只好教别人拼到底，我们认为那第一条应该修改，和平才容易实现。”^[22]可见，唐伯球对八项条件是有具体研究的，他认为，除了第一条应该修改，其余都可以接受。事实上，毛泽东的八项声明，最后也仅第一条修改了，其余七项被广泛接受。由于北平形势的转变，加上唐伯球努力回应毛泽东的八项声明，坚决反对以战求和，这次筹备会风向立马转变，议员们反战情绪高涨。其中凌兆尧、蒋绍葵、席楚霖等人皆坚持主和谈判，反对备战，代表了多数参议员的主张。

但此时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提出“保境恤民”的主张，认为湖南应持中立态度，反对国共双方将战争打到湖南境内。这本质上是一种求湖南自治的声音，代表人有参议员黄甲、熊雄、欧阳钧等人。这种观点，只需阅读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便知绝不可行。该文提出的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号召与八项声明的用意是一致的，中共显然无法接受所谓的湖南中立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无异于让湖南变相“独立”，对国家统一有弊无利。故这种声音并未得到外界热烈反响，观察家亦批评这种声音“过于天真”^[23]。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唐伯球及其他参议员态度转变的原因所在。唐伯球后来撰文回忆过自己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历程。他将自己态度转变的时间节点推前至1948年3月。当时，他在上海会晤了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的湘籍爱国人士郭春涛。郭彼时任民革中央常委，他要求唐伯球以湖南省参议会作掩护，发展民革组织，开展反蒋活动^{[17]306}。不过，唐伯球的追忆恐有将自己心路转变时间置前的嫌疑。唐确于1948年加入了民革组织，在其子唐鸿烈的影响下，赴香港会见了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李济深指示他返湘后反对征兵征粮，以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24]253}。但在唐伯球担任议长前，无论在言在行，他都拥护国民党统治，更不用说进行反蒋活动。待他担任议长后不久，他才坚决地执行了李济深的指示。让他更感国民政府背信弃义的是国民政府将长沙中央银行的黄金偷偷运走一事。此前他被保证央行黄金会留于湖南作建设之用，即使要运走也会提前告知他。但结果却是黄金运

走半月，他自己还被蒙在鼓里，致使他在筹备会议上遭到国大代表柳赠春严厉斥责，当时场面险些失控^[25]。与此同时，民革发言人在香港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发表了谈话，认为八项条件完全合情合理，必须坚持^[26]。唐伯球当是受民革影响，故对八项条件给予了充分肯定，虽在其个人看来，第一条惩办战犯尚有修改空间。

对其他参议员的言论，因多数未曾留下相关文字记录，故仅能从相关报道推测其态度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参议员们的态度转变，除了受北平局势和毛泽东八项条件声明的外在影响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参议员们对国民政府对湖南的政策彻底失望了。国民政府在湖南征兵征粮、运走黄金等事，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此时，参议员们自会审时度势，站在民意一边。这次对和平的呼吁便是一次证明自己是代表民意发声的机会。这个时候，参议员们对国民政府极为失望，故部分参议员在讨论毛泽东的八项声明时，竟然连第二条废除伪宪法和第三条废除伪法统都能接受。这也证明，彼时的参议员已不再关心所谓的中华民国法统，其对湖南省本土利益的关心显得更为迫切。

三 省参议会对于湖南和平解放的积极参与

前文已述及了省参会对湖南和平解放态度的转变，尚未阐述其在转变态度之后如何积极争取湖南和平。事实上，省参会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阻力。一方面，其需要挽回社会各界对其的信任；另一方面，其需要承受白崇禧“备战求和”举措的巨大压力。为此，议长唐伯球和副议长席楚霖既要联络外界力量响应和平呼声，又需在桂系的监控之下实现自救运动。

依照当时的局势，要实现真正的和平有三种可能的方式：第一是作战双方继续交战，直至一方被消灭，战祸自然完全熄灭；第二种是由局部和平到达全面和平，像北平和平解放一般，其他城市跟随北平获得和平解放，战事亦能停止；第三种是作战双方依照全国人民意愿进行和平谈判，商定达到永远和平的条件，实现全面和平^[27]。按时人的理解，三种方式中第三种方式最好，一种最坏，第二种方式介乎两者之间，可见走和平

谈判的路线似乎是时人的殷切期望。但是在真正和平之外亦有两种假和平方式,一种是所谓“以战求和”,其为白崇禧等顽固分子所坚决主张;一种是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谋求地方自治,实则为变相的“地方独立”,湖南省部分参议员便有此想法。

对于“以战求和”的观点,前文已有论述,在湖南省参议会内部争辩的过程中已被自行放弃,始终未采纳过,然而,保境安民的幌子却时时浮现出来。

起初,省参会打算采取向国共双方发电报提供和平建议的做法,当然,大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共同点是希望双方实现停战,且保障人民四大自由;不同点是向蒋介石建议停止戡乱一切措施,包括征兵征粮、释放战犯、开放言论自由及交还地方财政等,向毛泽东则建议准许人民代表直接参加和谈^[28]。从省参会对蒋介石的建议不难看出,其关注重点放在对本省的保境安民之上,欲取中立之立场。这一点,其与人民团体的意见有较大分歧,这种分歧集中爆发于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

1949年1月27日,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国大代表、立委、参议员、人民团体代表50余人参加,推仇鳌为主席。在仇鳌作报告之后,即讨论组织章程。其中关于章程宗旨一项争论甚久,具体而言,是对“促进国共双方停战言和”这一条之留删上有较大争议。国民党方的参议员朱岳峙相继发言四次,力争不能删节。其意以为必如是,然后是非黑白才分明,引能伸之,即此和平促进会言之目的在调协国共两党之争端,万一和平不成,责任当然属于共党矣。但是会上其他人士与仇鳌均不赞同其意见,彼等以为主战者非国民党全体党员,“即如我(仇鳌自谓)就没有助过战”。最后此条终被删略,章程其他各条,略有增减,大致通过。在人民团体与参议员的交锋中,人民团体有抬仇鳌以压倒唐伯球之势。省参会毕竟势单力薄,处于弱势,最后不得不在章程宗旨及领导权两方面都作出让步。然人民团体内部也混乱不堪,致使会场秩序大乱,有参议员申请退席。二者在该次大会当中亦形成鲜明壁垒^[29]。

可见在和平促进会中,尚无法真正凝结成团结力量。省参会向国共双方发电,希望双方停战的

行动似乎并未得到人民团体的认可,相反还被指责为国民党脱责。因发动战争的一方显然是国民党,电请双方停战无异于为发动战争一方推卸责任,自无助于真正的和平。参议员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愈发觉得,除非团结人民团体、充实力量,否则就没有收获真正和平之可能。省参会下一步的关键,便是解决与人民团体的矛盾。

为团结内部力量,同时扩大外部同盟,参议员们只有一方面参与省外和平促进会的运动,以此扩大和平力量,另一方面则是秘密会见程潜等高层人物,商谈湖南和平的方法。

向外省联络和平力量的任务主要交给了副议长席楚霖。前已述及,湖北省最先组织了和平促进会,且初始动机还和白崇禧逼蒋下野有关。但是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似乎并未按白崇禧的意图采取备战求和的姿态,在本省耆宿李书城、张难先等人的领导下,其积极呼吁和平,并邀请湘、赣、豫、川、桂、黔、皖等省代表出席参加2月5日的和平会议。湖南省派代表席楚霖和参议员朱岳峙赴鄂参会,并在会中达成消弭战祸、恢复和平的共识。席楚霖亦从这次会议中感叹到,人民的力量已成为第三者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公平正直、不偏不倚,是实现和平不可遏制的伟力。湘省民意机关当配合协助政府,积极加强自卫自存应变的各项部署,形成促进和平的力量^[30]。可以说,席楚霖的这次参会,积极争取到了与邻省互动的良机,为将来进一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求取和平与利用省参会配合政府做一些政府不方便公开的事情做了铺垫。

所谓的民意机关配合协助政府,当包含了做一些政府不方便牵头但需有人倡议之事。彼时,省府主席程潜正与中共秘密接触,商讨和平之事,很多事情不方便自己公开露面进行,尤其是公然反抗国府命令的一些事,适合由参议会发声倡议。如取消一切戡乱措施,停止征兵征粮,释放政治犯,反对运走黄金,禁止锡钨外运,发行辅币等事,皆有唐伯球和省参议会积极参与,其对程潜之湖南实行局部和平、反对南京政府对湖南进行积极掠夺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这些努力,省参议会亦逐渐重新获取了民众的信任。

转折的时间发生在4月20日,彼时,省参议会以湖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工商农教各界人士,借省参议会会议室,举行非正式的

座谈会,会议以避战自救为主旨^[31]。也就在同一天,省参会的驻省参议员,为争取和平之成功,特联名签署,向驻会委员会提议,成立一议案,电促中央,接受和平条款,从速签订协定,俾使和平早日实现^[32]。相较于此前参议员在和平促进会上对“促进国共双方停战言和”留删的争执,这一转折不可谓不关键。其态度明显由中立转变为放弃国民政府。两日后,在省参会成立了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并一致推举仇鳌为总主席。这次会议没有任何争执,各界人士均已同意“反战图存”的主张^[33]。会议宣言强调,湖南决不能脱离中国,彻底否定了企图使湖南变相独立的想法。可以说,这时候的参议会,已欲真切反映民意,与人民站于同一立场,呼吁真正和平了。

比之于处理与人民团体的矛盾冲突,应付白崇禧施加的各种压力要更为棘手。白崇禧虽于1948年12月底便提出“和平解决”的方案,但其看似“和平”,实则是在做备战的准备,可以说,白崇禧在各种场合所强调的皆是“备战求和”的态度。为此,他坚称“征兵征粮绝不能停”,且必须继续大量出兵出粮。这与湖南反战图存的目标可以说是背道而驰,自难被湖南民众所接受。白崇禧不断施加压力,企图从湖南民意机关入手,以达其备战的目的。1949年3月28日,白会见湖南省各机关首长。晚宴中白未发一点意见,却于宴后,待省府委员各厅处长离去后,约见参议会的唐伯球、席楚霖等数人,说明了他此行主要任务。因战事当前,他亦需“和平资本”,故坚持要征兵征粮才能为和平而备战。这一诉求在其他各省似无阻力,然湖南因情形不同,白希望湖南民意机关代表能拥护此等主张^[34]。不想唐伯球严正表示,此措施非但无济于事,还会极大影响民生。这可以说是回绝了白崇禧的要求。湖南最终也通过确立法案停止征兵征粮,避免了被桂系军阀榨取更多军事资本。

白崇禧显然不能容忍湖南和平运动的展开,在唐生智来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之后,白崇禧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前文述及,4月22日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成立,唐伯球认为当邀请唐生智来长沙与程潜共商争取湖南和平解放大计,并主持各界联合会的会务。此时,也只有唐生智的声望足以担当这一运动的领袖。唐

于29日抵长,5月2日下午,各界联合会在省参会礼堂举行欢迎大会,决定把“湖南各界人民争取和平联合会”改名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推唐生智为主委,仇鳌、陈渠珍为副主委,实行自保自救。自此,湖南和平自救运动也达到了高潮。5月6日白崇禧再度来长,宣称“局部和平无异投降”,将程潜的身边人事进行了大幅调动,以期控制程潜。与此同时,唐生智亦被列入白崇禧逮捕的黑名单。唐伯球探知后,连夜告诉唐生智,请其从速转移^[35]。唐生智见此情形,自知不可再留长,故秘密回到东安,继续进行起义工作。此时,省自救会已被白崇禧下令解散,湖南和平运动一度跌入低谷。白崇禧欲更进一步实施调虎离山计,将程潜调到广州任考试院院长,以进一步打击湖南和平运动。唐伯球召开参议会,决定以省参会名义致电李宗仁,挽留程潜主湘,并多方活动,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最终见效。可程潜在白崇禧眼中始终被视为眼中钉,终于在7月21日,程潜以出巡为名,避居邵阳,随同程潜去邵阳的还有唐伯球、刘岳厚等人。唐伯球到邵阳后,住在陈光中家作掩护,并草拟和平起义的通电稿以响应和平解放。此后留省参议员继续以参议会的名义发电保护市民。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唐伯球返回长沙,和唐生智等湖南耆宿及各界知名人士104人通电响应程潜、陈明仁的湖南和平起义。这些人中包括参议员席楚霖、陈云章、凌兆尧、方鼎英、蒋绍葵、陈兴、龚励初、高伯融等数十人,他们或可代表省参会的主流选择。

抗战胜利后,湖南省参议会作为民意机关得以正式成立,但本为代表民意以监督政府的省参会却长期起着“小骂大帮忙”的配合作用。这一依附属性,使得本应有较高地位的参议员们受到了舆论的颇多谴责。若从文化的观点视之,这种现象与湖湘文化把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对现代人格建构的漠视具有一定联系。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性亦使其具有急功近利的负面取向,其使人格失去独立的品性,形成依附的特质。曾有论者指出,“湖南是一个闭塞的内陆省,湘人人格更趋内敛,好讲裙带关系,普遍表现为一种依附型人格。”^[36]这一特质在省参会历次大会中,参议员们互相摆桌请客吃饭,极力讨好省府要员,

收其额外资费等事清晰可辨。然而,当社会剧变、湘省命运未定之际,省参会又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代表民意,寻求真正的和平解放。这时,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一面亦显露出来了,使得湖南成为北平以外第二个实现和平解放的省份(之后的衡宝战役为追击桂系之战役,无碍于整体的和平解放)。若单从“精神性”的视角观之,则湖南省参议员显然不足以构成一独立力量,不具备高度的自觉意识,但是从“实践性”来看,则湖南省参议会在湖南和平解放的转变中又着实发挥了旗帜性的引领作用,其与国民政府一方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可以说,湖湘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实现了升华性转化,并由此克服了原先依附人格的局限。

参考文献:

- [1] 宋锐乔.程潜回湘主政与湖南和平解放及其影响[J].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6):22-25.
- [2] 士湘.陈明仁与长沙和平解放[J].档案时空,2004(3):12-14.
- [3] 晓平.湖南和平解放时期的唐生智[J].零陵师专学报,1991(2):103-109.
- [4] 仇君好.仇鳌在湖南和平解放中[J].纵横,2009(11):17-22.
- [5] 陈再清.陈云章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夕[J].湖南党史,1997(1):32-36.
- [6] 王锡堂.周里与湖南和平解放[J].纵横,2007(10):50-54.
- [7] 叶介甫.余志宏策反程潜[J].财经界,2013(25):94-97.
- [8] 振宇.一个希望赵恒惕“提倡劳工”的工会! [J].向导,1922(10):79.
- [9] 赵恒惕.如何保持胜利成果[J].湖南省参议会会刊,1946(创刊号):3.
- [10] 湖南省参议会秘书处.湖南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辑览[M].长沙:湖南省参议会,1946:5-6.
- [11] 佚名.省政府欢宴参议员[J].湖南省参议会会刊,1947,第三次大会特刊(2):2.
- [12] 特约记者.湖南省参议会旁听记[J].观察,1947,2(21):21.
- [13] 高莊.湖南省参议会内幕[J].文萃,1946(37):22.
- [14] 谢文孙.联省自治前后:湖南参议会赵恒惕议长访问纪录(1960年5月至1961年2月)[J].郭廷以,沈云龙,校阅.口述历史,1989(1).
- [15] 佚名.传唐生智将来长任省参议会议长[N].湖南日报,1948-11-08(3).
- [16] 佚名.竞选省参议长方鼎英声势大 唐伯球也表示决投他一票[N].湖南日报,1949-01-03(3).
- [17] 唐伯球.自救救民 求和新生[M]//田伏隆.湖南解放纪实:上.长沙:岳麓书社,1999.
- [18] 刘公武.湖南和平解放的一个侧面[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12.
- [19] 佚名.省参会开座谈会商呼吁和平问题[N].湖南日报,1949-01-06(3).
- [20] 佚名.“促进和平”会上一篇备战声[N].湖南日报,1949-01-15(3).
- [21] 佚名.毛泽东昨对时局声明提出和谈基础八条件[N].湘乡民报,1949-01-15(2).
- [22] 佚名.唐伯球议长反对“以战求和”[N].湖南日报,1949-01-20(3).
- [23] 佚名.有此主张[N].湘乡民报,1949-01-21(2).
- [2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委员会.民革前辈与湖南和平解放[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
- [24] 佚名.“和平”的笑剧[N].湘乡民报,1949-01-18(1).
- [26] 佚名.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坚持八项和谈条件认为完全合情合理[N].湖南日报,1949-01-21(2).
- [27] 佚名.局部和平与全面和平(转载《香港星岛日报》社评)[N].湖南日报,1949-02-08(2).
- [28] 佚名.省参会向国共双方分别提供和平建议[N].中央日报,1949-01-21(4).
- [29] 佚名.“和平促进会”昨日胡乱成立[N].湖南日报,1949-01-28(3).
- [30] 佚名.白崇禧语席楚霖盼湘鄂密切合作[N].湖南日报,1949-02-11(3).
- [31] 佚名.省垣各界会商应变一致要求避战求存[N].长沙日报,1949-04-21(2).
- [32] 佚名.省参会将促中央接受条款[N].湖南国民日报,1949-04-20(3).
- [32] 仇君好.诗剑弦歌:仇鳌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214.
- [34] 佚名.白氏此行任务闻系要兵要粮[N].湖南日报,1949-03-28(3).
- [35] 张书志.殚精竭虑谋报国:记爱国民主人士唐伯球[J].湘潮,2005(11):47.
- [36] 田中阳.论近世湖湘文化精神的负面效应[J].求索,2000(6):114.

责任编辑:黄声波